

嘉山县志

(评议稿·)

嘉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

惠利 及於 子孫

第四十八	利	(1)
第四十九	惠	(61)
第五十	人物	(61)
第五十一	代人物	(76)
第五十二	惠	(78)
第五十三	及	(78)
第五十四	於	(89)
第五十五	子	(92)
第五十六	孫	(92)
第五十七	當	(92)
第五十八	代	(107)
第五十九	藝文詩詞	(115)
第六十	藝文詩詞	(127)
第六十一	一、	(127)
第六十二	(一) 縣志	(128)
第六十三	(二) 縣志	(128)
第六十四	(三) 縣志	(129)
第六十五	(四) 縣志	(130)
第六十六	(五) 縣志	(131)
第六十七	縣志	(134)
第六十八	縣志	(134)

第九编 人 物

第四十八章	人物传	(1)
第四十九章	人物表	(6 1)
第一节	古近代人物	(6 1)
第二节	现代人物	(7 6)
(一)	党政军界	(7 6)
(二)	文教科界	(7 9)
第五十章	烈士英名录	(8 6)

第十编 附 录

一、文献辑存	(9 2)
(一) 嘉山县设县原案始末备存	(9 2)
(二) 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始末 ...	(1 0 7)
(三) 县委、县人民政府文件辑录	(1 1 5)
二、艺文诗词	(1 2 7)
(一) 跃龙冈寻碑记	(1 2 7)
(二) 明光己酉火灾记	(1 2 8)
(三) 朱元璋诞生地记载	(1 2 9)
(四) 题流民图	(1 3 0)
(五) 明光十六景诗	(1 3 1)
三、县志编纂始末	(1 3 4)
四、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 4 2)

第四十八章 人物传

吴 棠

吴棠，字仲萱，号稼华，嘉山县三界人。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乙未举人。道光二十四年，以大挑官南河知县，后任桃源知县，不久又调任清河知县（今江苏省辖地）。吴棠办事认真，秉性正直，出任南河县时仅“携一仆，赁居僧楼，不事干谒”。摄碭山知县时“任事一月，清积案百数十起，补桃源知县，时丰口未塞，棠督民筑长堤御湖涨，购风车泄积潦，勘灾散赈，奔走于烈日中，民闵其劳为流泪。邑有淮滨书院，棠为筹经费，择主讲者，立课程……为肄业生剖晰经义，文教振起”。道光三十年，调任清河县知县。清河为南北要冲，差役滋繁，到任后即“禁胥吏苛派，缉赌博，严治盗贼，年余，政称最”。时清廷统治摇摇欲坠，满清皇朝对镇压太平军和捻军有战绩，治理地方有政绩者，莫不大加赞赏褒奖。咸丰二年冬，吴棠调署邳州。咸丰三年，复任清河知县。因他“办民困著，敌忾同仇，八约联络颖滁泗淮海徐扬”。咸丰六年秋，又奉皖抚檄，会办盱定滁来四属乡团。咸丰十年，吴棠升补徐州道，署徐州府知府。咸丰十一年，授淮徐海道，同年秋，擢升江宁布政使兼署漕运总督，督办江北粮台（不久又调任闽浙总督，未赴任）。同治六年（1867年），吴棠被清廷任命为四川总督。四川地域辽阔，民俗殷繁，弊端丛集，吴棠到任后，拒收馈赠礼物，明令裁去州县各种礼节，对成都原有的锦江、华阳两书院，加以充实扩大，又增设了尊经书院，刻印经史数十种，并筹仓储，禁私铸，清盐政，裁冗兵，养民恤士。同治八年，兼署成都将军，吴棠捐银万两，新建少城书院，并充实增加骑兵马涧。光绪二年（1876年），吴

棠

棠带病回至滁州，抵里九日即病逝。吴棠逝世后，清廷念其政绩和“剿贼功勋”，备加优恤，特颁诏书曰“前任四川总督吴棠，老成练达，办事勤能。由大挑知县擢任监司，循声卓著。嗣在漕运总督任内，带兵剿贼，保卫地方。历任闽浙、四川总督，克尽厥职。上年冬间，因患病准予开缺，俾得安心调理。兹闻溘逝，轸惜良深。吴棠着加恩照总督例赐恤，任内一切处分，悉以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伊子廩生吴炳和，著赏给举人，准其一体会试，用示笃念荅臣至意。”并赐祭葬，谥“勤惠公”。

吴棠有奏稿十卷及《望三益斋诗文集》四卷和清咸丰三年撰写的《重修清河县志序》等遗著。

注：引文均见光绪《盱眙县志》及《嘉山县志手稿》：“吴棠传”。

附：慈禧太后旨赐功绩最著文臣头品顶戴原任四川总督吴棠祭文

“朕惟身膺重寄，筹谋悉本乎哀忱；礼尚殊施，崇报难忘夫伟绩。盖论功以经邦为大，而眷旧以锡奠为隆。尔原任四川总督吴棠，柱石勋高，栋梁望重。遗艰投大，慰深宵旰之勤；戮力同心，定全局安危之策。历始终而勤事，为中外所交推。兹当归政之期，特重酬庸之典。沛鸿施于此日，溯骏烈于当年。温素优颁，嘉筵式锡。食俎豆升香之报，焕旗常载绩之光。聚米量沙，猷意长操胜算；陈设礼，允官籍富殊勋。灵而有知，尔其来格。”

李 泽 同

李泽同，字普卿，亦字浦青，明代勋戚重臣武靖王李文忠后裔，生于清咸丰七年（1857年），卒于民国七年（1918年），世居明光。

李泽同幼承庭训，少长博览群书，十六岁时入庠，经考试升入京师国子监，授贡生。虽精百家之学，但不染士大夫旧习，故名重乡里。时值晚清政治腐败，国步艰难，李泽同深受维新思潮影响，主张振兴华夏必须改革教育，遂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兴办学堂，名曰缉熙（缉熙：光明之意）两等学堂，即今实验小学前身。开创伊始，校舍无着，假东岳庙正殿及耳房作教室，原有菩萨砸烂移出。同年秋，李泽同复捐建校舍迁入，缉熙学堂益臻完善，本镇及盱、凤各地人士送子女就读者接踵而来。李泽同聘请名师授业，并自兼教习，所用教材均以切合时宜而自编选辑，夜辑日授，日久成帙。开使用乡土教材之先河，缉熙学堂男女兼收，同校同班，男女合班之风在盱眙全县（时明光为盱眙县西乡）尚属首创。

李泽同薄于名利，乐以助人，凡亲朋邻里有急难者，无不解囊相助。有远房表弟汪雨相入南京两江师范学校，毕业后两度参加学部复试，其费用皆由李泽同资助，后聘汪为缉熙学堂堂长。

民国初年，政局不稳，匪盗骚乱，溃兵滋扰，闾里不安，李泽同挺身而出，亲率商团乡练，捍卫桑梓，不避霜露，常深夜独自持械巡逻，明光乃得以确保。

李泽同一生著述颇丰，计有《群经诂劂》、《二南浅解》、《秦汉史要》、《历史纲要》、《清地理志》、《府厅州县考》、《明光乡土志》、《明光十六景》诗作等。清末民初，屡遭兵燹，藏书及著述几遭焚劫。今仅存《明光十六景》诗作。

邵 艺 五

邵树谷，字艺五，嘉山县三界人。1873年3月19日生，1946年重阳节前一日病故，享年68岁。少年时读书，聪颖好学，谦逊恭顺，初试不第后，次年清室废，民国肇起，遂罢科举，乃考南京政府担任公职。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三界山林层叠，常为盗匪啸聚之所，四处为虐，又以地处盱眙、来安、定远三县边陲，鞭长莫及，邵策勘察致地方居民，四处流散，衣食无依，邑绅也到处呼救，有时外地驻军逆剿，兵去匪来，兵来匪去，形成拉锯循环，兵燹匪患，地方百姓倍受其苦。

邵艺五对此极为焦虑，为靖卫故园，繁荣桑梓，毅然辞职返乡，并请兵剿匪。虽不谙军事，但为尽地主之礼，均冒生命危险，随军同行。一次出击，新营管长阵亡，他便与地方缙绅在明光筹建一所“新公祠”。

他也曾呈请中国红十字总会（设在上海）救济乡民，红十字总会视察后即拨专款设立难民救济所，直至家乡平定。红十字总会为此特颁一枚奖章给他，以表彰其体恤民情之功。

鉴于兵来匪去，兵去匪来的局面，他从长计议深思熟虑后，觉得三界如能建立县治，不仅本地可得磐石之安，盱、来、定三县边境地，亦可因而消除紊乱。因事关重划行政区域，三界田园久荒，民生凋敝，奔走筹建均需用费，遂与人商谈申请设治，并邀集有志邑绅吴耀虹、吴新南、程际唐等，悉力以赴，四处奔走，所需用费多方筹划，不足之处，私人捐助。

地方缙绅认为邵艺五系立县人，公议应以其名为县名，以作永

多方策应，屡次申报后，得省府同意。报请中央内政部批准，于1931年秋，安徽省政府特派李蔚唐为嘉山设置筹备员。李为留英学生，归国不久，被委以筹备设县重任后，及时赴盱眙、明光、三界等地，并与汪雨相、邵艺五等多次磋商，征求设置划界意见。李筹划有方，当年11月，经国民政府内政部和安徽省政府批准，正式设置嘉山县，县治所在地三界。李蔚唐首任县长。

设治后，邵艺五即间居家中，亦未谋求任何官职，常以书画自娱。

周朝珠

周朝珠，字合元，1897年生于自来桥，1959年逝世。他自幼家境贫寒，父亲以雇工、包烟、做挂面为生，后始富裕。1921年，他进入安庆中学读书，毕业后回自来桥经商。1940年春，建立嘉山抗日民主政府，他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带头将家里房子腾出一半给抗日政府办公，凡对抗日有利之事，他都带头去做并积极献款，组织各界人士慰劳抗日战士。政府推行民主政治，发动减租减息。周朝珠是工商业者，又兼有土地，他毫无顾虑地带头。应党和政府减租减息号召，以身作则，积极协助政府做好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多方联络工商界人士共同抗日。他还将自己的儿子周宗仕送到部队参加抗日，被誉为开明士绅。当成立淮南路东八县参议会时，他被选为路东八县参议员，为巩固抗日根据地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积极贡献。

教育及教育培养人才，汪雨湘，一九一四年，任芜

汪树德，字雨湘，嘉山县明光镇人，一八七八年生，1937年参加革命，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六三年逝世于北京。汪雨湘家世清贫，三代庸商，二十一岁时，参加清朝最后一届乡试考入泮为秀才，不久，由滁州熊鞠生介绍回盱眙县保送去日本留学，到日本东京后，汪雨湘进入明治大学经纬学堂附设安徽速成师范班，留学期间，正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同盟会广泛开展革命活动时期。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日（清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六日）以日本文部省徇清政府要求，颁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对留学生进行种种无理限制。是月二十六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东京出版，十二月四日，中国留学生八千多人，抗议日本政府颁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实行总罢课，汪雨湘积极参加了罢课运动，并担任本校纠察队长，在思想上“愤恨清廷更甚”。旋经四川籍同学李誉龙介绍参加同盟会，由于以陈天华、秋瑾为首的广大留日学生的斗争，《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最后没有能够实行。一九〇六年，汪雨湘卒業回国返盱，遭到官绅排斥，遂愤然回明，不久，考进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毕业后先后担任宿州志成师范、湖南长沙楚怡初等校教员。为了在家乡开展教育，后又离开长沙回明光担任了明光峰照附等小学堂长，其间，曾在学部复试获奖。辛亥革命爆发，汪雨湘立即停学前往安徽著名革命党人柏文蔚处，以柏文蔚为军长（亦称第一军）的第一军团组成后，汪雨湘被委任为秘书。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皇朝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国号虽易，现实依旧，汪雨湘感叹：“做这种腐败官僚是无济于国家的”。时安徽旅宁教育会成立，他担任了评议部长，并当选为赴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教育会议代表，回皖后担任了安徽通俗教育报社主计兼编辑，设想

以普及教育培养人才，以此改造社会，振兴国家。一九一四年，任芜湖甲种农校理化教员，他关心与爱护青年，循循善诱。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爆发了“五四”运动，消息传至，汪雨湘和二农师生一起，掀起一场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的斗争风潮。学生在游行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一九二〇年汪雨湘回明，担任学务专员兼首席校董。一九二一年汪雨湘任芜湖甲种农业学校校长，年初，恽代英应芜湖学生联合会邀请，从宣城到芜湖，给省立五中和芜湖二农师生做了题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废除二十一条》的讲演。同年秋，汪雨湘改任滁县省立第九师范校长。他以身作则，为师生做出榜样，积极改善教学条件，不久完成了教学楼工程。后又调任安徽省教育厅督学，此时，声名狼藉的军阀马联甲督皖，汪雨湘愤而辞职，不久又任盱眙县教育局局长兼安徽省立第九中学校长，时各县教育经费都从地方学产筹措，为堵塞漏洞，他积极整理教育款产，反对挪占、克扣教育经费，触怒了官绅刘荣甫、陈佩九等，竟收买打手，闯入县教育局，将汪雨湘背部殴打成伤，主持正义的教育界人士组织了“汪案后援会”，迫使当局责令肇事者赔礼道歉。后汪雨湘回至明光，与三界地方士绅邵艺五等积极提出呈文，请求设县，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嘉山正式设县，县治所在地三界，李蔚唐任县长。汪雨湘担任了县财委会委员长，负责管理公学产，并积极整顿地方财务，成效显著，自己则勤俭节约，不乱开支一文，不久又因触犯地方官绅，被解职回明。为使设置不久的嘉山，编纂一部县志，他与省通志馆取得联系，查阅馆藏历史资料，并积极采访，编纂《嘉山县志手稿》，在两三位助手协助下，历经数年完成手稿十八卷，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爆发，在民族危亡紧急关头，汪雨湘在长子汪道涵的进步

影响下，决定带领全家及亲友共二十余人，离开明光前往延安，历经艰险到达西安。从西安去延安，为避免可能发生意外，他与子女商量后，忍痛将一个孙子，一个孙女，还有同行的秦其谷、李正恩的孩子，由汪道涵同志送至西安育婴堂，然后奔赴延安，到达延安后，受到了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汪雨湘经党组织分配至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任秘书长，他在厅长刘景范支持下，办了多期训练班，亲自授课，为民政厅和各机关培养了一批人才。一九四一年，延安市参议会进行选举，民政厅及所属机关提出并推荐汪雨湘为候选人，经刘景范厅长介绍和推荐，汪雨湘当选为延安市参议员，随即又被当选为延安市政府委员。并负责教育经费管理委员会工作，在延安期间，一边工作，一边积极参加大生产运动，纺纱、开荒，积极鼓励与支持子女为抗日民族解放事业贡献力量。一九四八年，他跟随中央机关转移到河北平顶山县西柏坡，在那里，经安子文和张曙时两同志介绍，并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汪雨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讨论汪雨湘入党前夕，周恩来同志曾打电话问他当时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儿子汪道海：“你对你爸爸入党有什么意见？”汪道海向周恩来同志汇报说：

“他早就要求参加共产党，请中央决定”。建国后，汪雨湘虽已七十二岁高龄，仍要求中央派他到华东地区工作，到华东后，悉心研究水利和农业，收集了黄河、淮河水利资料，提出许多建议，并将他带到延安后保存多年的《嘉山县志手稿》于一九五九年献给中共嘉山县委和县人民政府。他曾深有感慨地说：“我在追求真理，寻找光明的一辈子中，能够在晚年跟着党走，并把全家带到革命阵营里。走上革命的道路，也就完成了自己的夙愿”。

从1941年至1943年 程今吾

担任了程今吾同志，一九〇八年出生在嘉山县女山湖七里湖畔的津里镇。少年时代性格内向，沉默寡言，曾就读于本县明光小学和徐州中学。一九二九年，他在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南京晓庄师范读书时，在陶行知先生谆谆善诱教导下，奋发上进，经常深入学校附近乡村，为贫苦孩子办识字班，任小“先生”，是陶行知提倡大众化教育的热情宣传者和实践者。晓庄师范毕业后，今吾同志先后在浙江嘉兴九溪中学、广东大埔百侯中学、安徽蚌埠、亳县等地中学和贵池乡村师范学校“为了糊口，当了个穷教员”。一九三三年夏，程今吾同志接受陶行知先生的推荐，到广东大埔县，参与恢复百侯中学的工作。当时他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却奋力追求进步，向往革命，深受学生的爱戴。他在上课时，很少讲授课本中的文章，大量选读的是鲁迅的《野草》、高尔基的《海燕》、《我的大学》和《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等课外读物。在他的影响下，象《毁灭》、《铁流》、《士敏士》、《资本论大纲》、《唯物辩证法入门》一时都成了进步学生争先阅读的热门书。此外，他还通过学校办的小工厂、小农场、以及参加必要的社会活动，引导学生把书本知识和实际结合起来。对此，杨应彬同志深有感慨地回忆说：“我是程今吾同志的学生，自从一九三三年受到他的直接教育以来，至今已近半个世纪。他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个启蒙教师，他的风范和革命精神，一直铭刻在我的心头”。一九七〇年五月十四日含冤逝世，终年六十一岁。

抗日战争爆发后，程今吾奋起参加抗日救国活动，于一九三八年一月正式参加革命，同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江苏失学失业青年工读服务团党支部书记、团务委员兼教务主任，湖南辰溪县委组织部长，广西桂林“生活教育社”党支部书记，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

。从1941年至1943年冬，根据党组织的决定，程今吾同志又担任了陶行知先生在抗战时期创办的育才学校研究部主任（校址在重庆北碚草街子）成为陶行知先生的得力助手。1942年，端午节将近，一天，育才学校的邻居不慎失火，重庆市国民党当局诬指育才学校失火，要以违禁法令拘捕陶先生，这时，程今吾同志挺身而出，说：“学校的事，陶先生已委托我办，你如要拘捕学校的主人，我去！”今吾同志在关键时刻大义凛然，无所畏惧，气节颇为感人。

1944年，程今吾同志离开重庆，到达他久已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担任八路军抗属子弟学校校长。该校座落在延安枣园附近山沟里，条件差，设备之简陋可想而知。尽管当时物质条件相当困难，但他毫无怨言，总是说：“物力的困难，并不能阻止工作，在进步的政治条件下，我们都有发挥劳力，克服物质困难的自由！”解放后，1949年冬，程今吾同志调任中央教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56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62年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第二书记、副校长，在工作中，他忠于职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有用的建设人才。1964年，程今吾同志作为中国教育界的代表，出席了“北京科学讨论会”，为发展我国教育和科学事业，加强国际学术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十年动乱，一场浩劫。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下，程今吾同志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不幸于一九七〇年五月十四日含冤逝世，终年六十一岁。

1978年9月19日，中共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作出决定，彻底为程今吾同志平反昭雪，并高度赞扬程今吾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一生”。1982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建校八十周年之际，由北师大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程今吾教育文集》。

附： 忠诚于人民 精勤于事业

谢 永

今吾同志惨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共同伙康生之流的残酷迫害，与世长辞已经十二个年头了。每当我国想起与他共同生活、战斗的日子，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

今吾同志是一个毕生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教育工作者。他早年受教于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主办的南京晓庄师范，自青年时代起就投身于进步的教育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奋起参加抗日救国活动；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的领导下，他或在国民党统治区以教育为公开职业，进行党领导的革命活动；或在革命根据地直接战斗在党的教育战线上。全国解放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也一直从事党的教育工作。在他几十年的教育革命工作历程中，既有相当长的时间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分管教育的部门中工作，也有相当长的时间战斗在教育战线第一线——他担任过小学教员、校长、中学教员，从事过社会教育、师范教育等工作；也担任过教育理论研究工作和教育行政工作；最后，在十年内乱的“文化大革命”中，作为首当其冲的第一线战士，倒在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的工作岗位上。

在与今吾同志几十年的共同生活、战斗中，他那种对事业的责任心、创造性，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他常说，我们就是要按革命导师的教导，坚持理论与实际的有机结合；既反对脱离实际的空洞理论，又反对脱离理论的盲目实践。他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把党交给的工作做好。他善于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结合工作实际，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研究，创造性地进行工作；总是力图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同实际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与此同时，他十分注意工作经验的总结；每当工作一个阶段，完成一项任务之后，他总是尽力把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心得、条理化、系统化，整理成文。

5月《新教育体系》一书，是今吾同志于1941年春至1943年冬，在党的领导下，任陶行知先生在抗战时期创办的育才学校（校址在重庆北碚草街子）研究部主任时对教育理论的探讨。他曾用讲座的形式在该校业余讲座宣讲过。后经修订、整理，由当时在育才学校文学组学习的郭冶方同志等帮助誉清。1944年春，交重庆时代印刷出版社出版。1948年秋，曾由生活教育社在上海再版。

1944年春，今吾同志由重庆调回当时我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延安后不久，曾在延安八路军抗属子弟学校工作（任该校校长）近两年。《延安一学校》一书就是这一时期该校师生员工学习、工作的生动实录与教育经验的系统总结。初稿于1946年春在该校所在地延安邓家沟写出。后在前往晋冀鲁豫边区的几千里行军中，今吾同志把初稿和有关资料随身携带，行军中利用间隙，在西北、华北农民的窑洞、土屋中，凑在昏暗的豆油灯下，翻阅初稿和资料，修订、整理；就这样，经过几个月的边走边修改，在1947年7月，到达太行武安大井村（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招待所驻地）后不久，完成了该书最终稿。于同年冬由晋冀鲁豫边区华北新华书店出版。由于当时边区印刷条件的限制，原来准备插入该书编排的有关学校学习、劳动、生活等实际活动的照片，无法制版，只好仿照八路军

子弟学校窑洞校舍的照片搞了一幅木刻版画作为该书的封面装帧。全国解放后，东北、华北、华中等地新华书店，又照初版原样先后重新印刷出版。

《工农读书教学的实际经验》一书，是今吾同志1948年春在华北新华书店创办“青年职工学校”工作的总结。从1948年5月起，在太行武安赵庄（华北新华书店所在地），他挤出工余时间，写出了该书初稿。同年秋，他调到中央宣传部徐特立同志主持的教育研究室任研究员；10月，在该室的所在地北岳井陉七亩村，将该书修改完毕。全国解放后，1949年在北京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63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再版。

《青年修养》一书，是在全国解放前夕，今吾同志接受组织给的任务，为初级中学编写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教材。1949年3月由北京新华书店出版，同年3月再版。

此外，抗日战争时期，今吾同志在武汉、湘西、桂林、重庆等地，曾撰写和发表过一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党的抗战救国路线、方针、政策，引导青年走向革命的有关抗战教育方面的文章；还曾编写《集体英雄主义故事》等书。全国解放后，他在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作期间，在《人民教育》、《中国青年》、《学习》、《人民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过一些有关教育工作、青年道德修养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文章。

1962年秋，今吾同志满怀希望和信心，朝气蓬勃地到北京师范大学工作。在校党委的领导下，他与全校师生员工共同钻研提高教学质量，研究教育科学，和加强各门学科的科学研究工作，为探索如何扎扎实实培养国家需要的合格人才，办好一座社会主义大

学的经验而共同辛勤地工作和学习。他着手收集资料，逐步总结经验，并计划准备撰写一本名为《北京一大学》的书，为党的教育事业做出新的贡献。然而，祸国殃民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不仅毁灭了今吾同志这个原来可以实现的计划，而且夺去了他的生命。他逝世时，年仅61岁。几十年他辛勤收集和亲自撰写的大量资料、手稿，包括那艰苦的年代在行军中，历尽艰辛保存下来的宝贵史料，如与《延安一学校》有关的五、六十张珍贵照片等，均因“抄家”、“扫地出门”而丧失殆尽。

“乌云终究难遮日”，我们党彻底粉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党也为今吾同志平反昭雪，恢复了政治名誉。现在，保留在世的今吾同志部分遗著，经过同志们共同的努力，庆幸又能同广大读者见面了。

这次，北京师范大学决定出版《程今吾教育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及有关同志为文集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吾同志的老战友杨应彬同志（现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秘书长）、韩作黎同志（现任北京市教育局顾问）为文集写了充满战斗情谊的序言；伍必瑞同志（现任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主任）为程今吾同志作了神采奕奕的画像。作为今吾同志的亲属，我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录自《程今吾教育文集》）。

1946年8月，他随军北撤至东北，不久组织分配他到大连做兵工生产工作。他克服重重困难，

注：谢永同志系程今吾同志爱人，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已离休。

一民被调至北京，继续从事国防机械工业工作。不久被任命为中央第八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在八机部工作中，他积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思想作风正派，为人光明正直，工作勤恳认真，善于